

回眸中国出版业（七）

马敏 主编



目 录

装帧设计工作	1
编务工作	15
书刊印刷工业的建设与发展	31
书刊发行工作的发展与改革	136

装帧设计工作

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书刊的物质外貌和形态，是构成书刊的重要部分。书刊的封面往往蕴蓄着书刊的气质，提示书刊的内容，给读者以第一印象的媒介作用。不少读者往往由于书籍装帧吸引了他，而萌生买书的兴趣。所以，广大的读者和编辑出版工作者，对书刊装帧工作无不要求精益求精。

中国的书籍装帧工作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优良的传统。进入近代时期，中国出现现代涵义的期刊，开始期刊的装帧史。在本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于鲁迅的倡导和实践，使中国的书刊装帧史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装帧设计逐渐形成一门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新中国成立四十年中，书刊装帧艺术又迈进了新的殿堂，装帧工作队伍不断扩大，书刊的装帧设计也从开始时主要突出封面而逐渐转移到重视包括护封、书脊、封面、环衬、扉页、插图以及编排设计、章节页、版权页等整体设计上，向着更实用、更美观、更成熟的方向发展。当代中国的书刊装帧艺术是继承历史传统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产物，具有自己民族的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出版界对书刊装帧工作就很重视。一九五五年在北京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同时举行了包括书刊装帧作品在内的出版事业展览会。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在全国出版会议题词中，把从事出版工作的艺术家、制图人员、装帧工作者与出版家、著作家、翻译家等相提并论，使装帧工作者深受鼓

舞。其后，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出版社都配备了美术编辑，有的多达五、六名，单独成立美编室，专门承担图书的封面设计。此外，社会上业余从事书刊封面设计的人数也相当可观。

在这一时期，书籍装帧设计工作者对装帧设计的指导思想，一是强调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形式必须服从内容；二是学习和继承传统，发扬民族风格。在设计风格上开始重视构图，色彩的装饰性与纯粹写实，形成两种并存的不同风格，为书籍装帧设计开辟了“百花齐放”的前景。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政治书籍的装帧常常采用严整的字体，鲜明的色彩与简洁、严肃的构图。《毛泽东选集》是极有代表性的例证。政治书的小装饰经常使用五角星、镰刀、斧头和传统的几何纹样。文艺书及其它出版物，除了用写实的人物处理外，大多数用传统的图案纹样作装帧，特别喜用敦煌的唐代纹样或西安碑林或汉砖的石刻纹样。这个时期的书籍以平装为主，精装较少，因而着力在封面设计。封面设计一般以凸版为主（极少胶印），颜色多在三套色以内。限于当时的制版、印刷和纸张条件，封面设计只能同步进行。总的说来，从新中国成立起，书籍装帧工作者就作了很大努力，为装帧设计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五九年，文化部和美术家协会在北京联合举办的“全国书籍装帧插图展览会”，是中国五十年代装帧艺术成就的一次大检阅。这次展览会是为了参加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举行的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作准备的。从各地选送的展品中评选出 500 多种，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沈阳、西安、重庆等地展出。

从这次展览中可以看到，中国书籍装帧艺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出现了不少较好的装帧设计作品，不少美术家还给文学创作和少年儿童读物绘制了插图，印刷、装订质量有不少改进。在使用新的装帧材料方面，范围也较过去扩大。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楚辞集注》，在装帧设计上突出中国线装书的特点，这种特点又与古典著作相适应。它除了分卷用线装并有包角以外，加上一个古色古香的六合套的如意套，突出了中国的民族风格，在国际书展中获得普遍的赞誉。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五体清文鉴》，构图严谨，装饰富丽而又恰如其分。三联书店出版的《蔡特金传》在麻布封面上方置蔡特金版画头像，朴素大方，显示了一个革命者的风貌。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家》，只在一个白封面上印上一个近似菱形的正方朱红、红上加印黑色的隶书“家”字，紧紧掌握住了中国民间艺术的特点，明确而又含蓄地表现出了一个中国旧式的家，整个设计手法简洁，惜墨如金。在儿童读物设计中，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朵朵葵花朝太阳》的封面用剪纸形式，以儿童、太阳及葵花表现主题，最下端以儿童体题写书名，稚拙中见聪慧。《啄木鸟医生》封面用胶版印刷，满版以木纹做衬底，书名以下用卡通手法画了一个戴红十字小白帽和眼镜的啄木鸟，脚上还提了一个药箱，既符合儿童心理要求，又紧扣主题，对描绘啄木鸟的特点和提倡保护鸟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次展览会的佳作甚多，《中国货币史》、《果树修剪技术》、《朱德同志的故事和传说》、《李有才板话》、《塞上烽烟》、《神笔马良》、《儒林外史》、《西北的紫花苜蓿》等书，以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工学士、博

士藏画集》、《永乐宫壁画》、《杨柳青年画资料集》和《敦煌莫高窟艺术》等画册都是。

在一九五九年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上，《楚辞集注》、《永乐宫壁画》、《五体清文鉴》、《苏加诺工学士、博士藏画集》、《上海博物馆藏画》等荣获装帧金质奖。

获得装帧银质奖的有《中国货币史》、《杨柳青年画资料集》。《朵朵葵花朝太阳》获得儿童书籍奖。《在森林中》和《儒林外史》获得插图银质奖。

获得铜质奖的有《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及《我们的故事》，《玉仙园》获得插图铜质奖。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参加莱比锡国际书籍展览会，对于介绍中国书籍艺术的民族传统和扩大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

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书籍的开本、字体、版面、插图、封面、护封等，既是书籍的组成部分，也是书籍装帧艺术的要素。这些装帧各要素应在统一的美学构思下进行整体考虑，才是含义完整的书籍装帧设计。中国五六十年代的装帧设计工作中一个明显的缺陷是比较忽视总体效果，只把封面设计和插图视为装帧设计（或称美术设计），而把重要的版式设计列入技术设计；美术编辑只管设计封面，技术编辑负责设计版式，两者缺乏配合，从而影响了装帧设计水平的提高。另外，设计思想比较拘束，很少借鉴国外的手法；理论探索与研究不够，加之装帧材料和工艺水平的局限，都制约着装帧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文化荒芜，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主要是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样板戏剧本，还有一些政府文件。这些书籍的封面离不开红色，

形成一片“红海洋”。因此装帧设计工作十分单调，谈不上什么创新；但装帧用材有所发展，就是在材料上开始运用塑料压膜和电化铝，出现了大量的塑料封面。

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事业迅速发展，出版社和期刊社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与书刊相互关联、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装帧工作随之得到迅速发展，到一九八九年止，从事书刊装帧设计的人员超过 5000 人，形成一支比较大的队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

同时，出版界对书籍装帧工作更加重视，其中尤以北京、上海及四川、湖南、山东、东北三省等地区的工作抓得紧，有的已做出较大成绩。特别是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海外同行的成果和设计思想，开阔了中国装帧工作者的视野，在思想和技术上都比过去闭关锁国时期有了突破，装帧设计的书籍不再是老一套的固定模式，正在探索现代中国书籍装帧的风格。装帧事业的复苏与发展，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和宣传

一九七九年七月七日，国家出版局在北京召开书籍装帧设计座谈会，由国家出版局副局长王子野主持，胡愈之等 60 余位知名人士、作家、美术家和宣传、文化、出版部门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指出：“书籍装帧设计不仅是出版工作的重要环节，也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和工艺水平。建国以后，我国的书籍装帧取得显著成绩，受到了国内广大读者的称赞，也赢得国际声誉。但由于文化专制主义造成的恶劣影响，我国的书籍装帧不仅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也落后于我国原有水平。”会议呼吁：“要从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

要创造出能反映我国现代水平的书籍装帧艺术，还必须大力培养和使用书籍装帧的专门人才，并要求印刷技术条件和装帧材料生产供应的配合”。这次会议在书籍装帧设计界具有重要的意义，给书籍装帧事业的发展开辟了美好的前景。

在这个会议之前，国家出版局就已经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推动书刊装帧工作。国家出版局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成立了全国书籍装帧设计展览筹备会，由筹备会办公室编印的刊物《书籍装帧设计》，一九七八年七月开始出版，至一九七九年底，共出版 21 期。后来改名为《装帧》，到一九八三年停刊，共出版 23 期。这个刊物虽然为内部发行，而且篇幅有限，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关于书籍装帧设计的专业刊物。它经常报道装帧界动态，发表学术论文，对沟通全国各地装帧界情况，促进装帧艺术的探讨与交流，都起了一定作用。

“文化大革命”以前，书籍装帧工作者在艺术的创作实践方面是积极和努力的，但把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并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创新，相对来说比较落后。反映在出版物上，专著比较少，在有关刊物上理论文章也不多。专著方面，“文化大革命”以前仅出版了《钱君 装帧集》、《张光宇插图集》等有限几种。从《书籍装帧设计》创刊以后，一九八一年，《美术》杂志特地为书籍装帧艺术出了一个专辑。《出版工作》和《编辑之友》等刊物经常刊登装帧工作者写的学术论文和介绍装帧设计家的文章。《人民日报》海外版在一个时期内开辟了《装帧艺术》专栏，不时刊登一些评介优秀书籍封面的短文。国际书店主编的《中国书讯》，也有一些介绍装帧设计的文章。另外，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出版的《世界书讯》，有时介

绍国外的书籍装帧设计，为了解国外同行的动态提供了一个窗口。而出版的装帧艺术专著也显著增多，有《装帧艺术谈》、《鲁迅与书籍装帧》、《当代世界书刊装帧艺术》第一集、《张守义外国文学插图集》、《曹辛之装帧艺术》、《中外装帧艺术论集》、《书籍装帧艺术史》等书。江苏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八年夏推出了中国第一套《装帧丛书》，包括《中国书籍封面集萃》、《外国书籍封面集萃》等4种。这些出版物对于装帧工作者的业务进修、经验交流和理论探索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展览和评奖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至四月十日，国家出版局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会，由出版界、书籍装帧界和美术教育界的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展览期间，有关专家、中央一级和部分地方出版社的装帧工作者就中国书籍装帧工作的现状和改进的措施举行了座谈。

这次展览会是规模空前的装帧艺术展览，也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后短短两年多的装帧水平的全面检阅。共展出各地82家出版社的各类书籍和设计图稿1100余种，按照政治、文艺、科技、文教卫生、少年儿童五个大类布展。在北京展出历时二十天，观众达5万余人，并开展了优秀作品评选活动。以后又赴杭州、长沙、西安三市巡回展出，普遍得到好评。美国出版家泰勒在参观展览会以后表示，如此琳琅满目的装帧设计，使他感到来中国不虚此行。

展览会展出的作品中，有61种获奖。其中获得整体设计奖的有曹辛之、曹洁设计的《新波版画集》（精装，人民美术出版社），吴寿松等设计的《红楼梦》（精装，

外文出版社),何礼蔚等设计的《中国动物故事集》(精装,上海文艺出版社)等3种。

获得封面设计一等奖的有钱月华设计的《伟大的道路》(平装,三联书店),陆元林设计的《姑苏春》(精装,上海文艺出版社),章桂征设计的诗集《北方》(平装,吉林人民出版社),王卓倩设计的《示波器原理与检修》(精装,人民邮电出版社),简毅设计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平装,少年儿童出版社)等8种。

获得封面设计二等奖的有张慈中设计的《资本论》(特装,人民出版社),倪震设计的《新世界的儿女》(平装,人民文学出版社),曹辛之设计的《寥寥集》(平装,三联书店),陶雪华设计的《黑潮》(平装,上海译文出版社)等10种。

获得封面设计三等奖的有宁成春设计的《辩证唯物论大纲》(精装,人民出版社),刘仁毅设计的《丽日南天》(平装,广东人民出版社),王沙城设计的《聊斋志异》(精装,上海古籍出版社),任意设计的期刊《外国文艺》(平装,上海译文出版社),李瑞生设计的连环画《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等24种。

此外,获得插图一等奖的有詹忠效画的《晋阳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周菱、秦元阅画的《苏文纳和她的儿子》2种,获得插图二等奖的有3种,获得插图三等奖的有5种,获得插图荣誉奖的有3种,还评出了印刷装订奖3种。

展出的优秀作品中,既有图案古朴雅致,体现出鲜明的传统民族风格的设计,也有开放以后,在外来文化影响下出现的构思大胆、新颖,具有现代气息的作品。共同的特点是,设计者都在为创造现代化中国风格的书

籍装帧艺术而辛勤探索，无论在继承传统的民族形式和借鉴外国的表现方法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色。它们不是古的、洋的翻版，而是当代的、中国的，表明在装帧艺术上已具备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例如倪震设计的《新世界的儿女》，其封面的构思和表现手法，以及色彩的运用都有新意。设计者根据小说的主要内容是阿尔及利亚妇女在革命中的觉醒和成长，封面集中于一个引颈迎向朝阳的年轻妇女的侧面头像：面部为霞光染得分外鲜明，头像富有雕塑感，顶天立地，头顶直抵封面上缘，颈部连接大地，浑然一体。地面上的仙人掌，使人联想到非洲。主要色彩是黑色，覆盖着封面的一半，不但不显得昏暗，在黄色背景和橙色面部相互对比之下却反衬得十分鲜明、强烈，加强了画面的艺术效果。这样的构图和色彩，既体现了该书人物的基本精神面貌，同时又象征着希望的力量。又如具有浓郁南国情调的散文集《丽日南天》，设计者刘仁毅在封面上用了被阳光镶起明亮边缘的浓黑粗大树干，以及从树干间隙露出清澈艳丽的蓝天，如火的木棉花朵怒放，这一切构成了逆光中观察丽日南方的常见情景。正是这种新颖构思所展现的意境，圆满地体现了该书所介绍的内容。

在这次展出的作品中，在政治书和科技书方面也突破了以往常见的设计方式。政治书的设计不再一律以镰刀、红星作装饰，使封面显出生气，这是设计者冲破老惯例，深入思考的结果。

令人欣喜的是，这次展览的展出说明和某些展品，不论是精装本或平装本，都已开始注意到装帧设计的整体性，都认真考虑到了开本、护封、封面、环衬、扉页、版面、头花等项目的整体感，比较完善地达到了和谐统

一的艺术效果。

为了不断提高书籍装帧水平，促进书籍装帧艺术的繁荣，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继续举行一系列评选活动。一九八一年五月和一九八二年七月在北京举办了两次全国书籍装帧优秀作品评选活动。全国各地的装帧工作者纷纷到北京观摩。

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两次“书籍装帧艺术十人作品展”。参加第一次展出的作者有：仇德虎、叶然（诗刊社）、刘玉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张慈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吴寿松、沈云瑞、柳成荫、钱月华、温泉源。参加第二次展出的作者有：王荣宪、王士忠、李文昭、张凤宝（中华书局）、张灵芝、陈文鉴、陈允鹤、尚佩芸、郑在勇、曹洁。这20名装帧设计家中，从事装帧工作大多数在三十年以上，并且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这是三十多年来，他们的优秀作品第一次集中展览，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书籍装帧界第一次以设计家组合的专业设计展览，得到出版界、美术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王子野为两次展览写了《序言》。

一九八五年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报刊报》编辑部、《美术》编辑部、中央电视台新闻部联合举办了全国期刊封面设计评奖。评奖范围是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上半年正式登记出版的期刊封面。这种评奖，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255种期刊参加，封面作品有1460多件。评奖通过初选，展出781幅封面。在群众评议的基础上，由出版界、美术界著名人士组成的评委会进行评选，按综合、文艺、科技、少儿四大类，共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19名，

三等奖 44 名。

在获奖的作品中，有的既保持了期刊本身的系列化，又年年创新不落俗套。如获综合类一等奖的《书林》封面（上海任意设计），它以图案的形式，每期用不同的色彩，勾画出同样的层层藏书的书架，“书林”二字嵌入其中，让读者如入书林丛中。又如获综合类二等奖的《自学》封面（北京吴波设计），有一期用一颗大树树干横断面的图片，含蓄地表现自学成“材”。再如获文艺类一等奖的《雨花》杂志封面（江苏朱成梁设计），既有地方特色，又有文艺气息，安排刊名、期号都比较严谨得体，每一期一换的水彩封面画，富有江南的诗情画意。

三、突破和创新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的书刊装帧艺术与旧中国的水平相比，有明显的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对书籍的整体装帧设计重视不够，再加上人为地设置了不少障碍，如黑色代表反动、灭亡，灰色表示消沉、绝望，等等，束缚了装帧工作者的创造性，因而较大地影响了这门艺术的提高和发展。那时大多数书刊的封面，特别是政治、科技和学术类书刊的封面，构图拘谨、简单，色彩单调、贫乏。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变成了“红海洋”。国外出版界、文化界有人曾比喻说，中国图书是“稻草盖珍珠”，意思是内容很好，可惜装帧太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装帧界解放思想，观念更新，勇于开拓，在短时间内就使装帧设计工作的面貌焕然一新，集中表现在前面介绍的多次展览、评奖活动中出现了大量佳作。例如钱月华设计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封面以朱德戎装骑马的黑

白照片剪影，表现这位伟人坚定、质朴、辛劳的一生，十分得体。尤其经素白封面上布满红色折线的衬托，表现人物历程的曲折，也更体现他的伟大，使含义更加深刻。郑在勇设计的《论指挥》一书，封面满版黑色，立意来自设计者对乐队在乐池中演奏时气氛的体会。一条灰色曲线表现指挥棒运行的轨迹，黄色书名使人联想起乐池中点点的黄色灯光，抽象的造型，象征的语言，这一切都与本书音乐理论著作的性质十分吻合。特别是本书在封面上大片使用黑色，冲破了过去的色彩禁区。再如科技书《明天是计算机世界》封面，在过去，很可能画上一个计算机就了事，这就味同嚼蜡，毫无兴味。但是设计者赵兴隆大胆想象，行家评论说：“把计算机的纸带幻化成一片长满大地的绿草，郁郁葱葱，蓬蓬勃勃地把读者引向计算机世界的明天。”

在一九七九年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会中获得一等奖的诗集《北方》封面，是由章桂征设计的。整个封面以白色为主调，以几棵银色松树为主要对象，松树间点缀几个人物以衬托树木的高大，以显示茫茫雪原。整个封面给人一种含蓄、朦胧的美感。设计者运用简练的形象和形象间彼此的组合，形成丰富的内涵，犹如一首唐诗绝句，意境深远。

期刊的封面设计同样有显著的突破性创新。一九八五年在全国期刊评选中荣获一等奖、由杨志麟设计的《少年文艺》第一期封面，是一个“少”字特写，它像红领巾在飘扬，又像少先队的队号在吹响；以后各期的封面都用剪贴画装饰。全年各期的封面，从构思到形式都体现出少年的个性，与少年文艺刊物的品格相符合。

总之，中国的装帧工作者在继承优良传统与吸收外

国装帧艺术营养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书刊的封面呈现出绚丽多姿，既有古朴雅致、诗情画意的民族风格，也有融会了国外同行的手法，驰骋于形式与色彩变化之中的作品。如果说，前面提到的《论指挥》的封面有点“洋”，那么姜 设计的《辞源》就以浓厚的民族风格给人带来韵味。设计者采用名花牡丹作装饰，以名花喻名著，相得益彰；封面分成十二个方格，用十个格安置浅浮雕的牡丹花，中间两个方格安排烫金的书名。这种分格式的构图，表示《辞源》包含丰富的内容与词条按部首排列的特点，选用深赭色小桔皮纹全漆布面精装，既体现了古色古香的气质，又符合工具书长期使用的要求，整个封面凝聚、庄重、古朴、雅致。

八十年代，书刊装帧的工艺水平不断有所提高，精装书的数量较之五十年代大为增加。一些出版社还出版装帧富丽堂皇、材料品质上乘的豪华本，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包括《浮士德》、《红与黑》等 10 部名著的豪华本《世界文学名著丛书》，采用双绉丝绸作封面，每本书颜色浓淡有别，正文纸采用色彩柔和、淡雅的象牙色调。每套书装帧雍容华贵。

书籍装帧的总体设计在八十年代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不论是精装本或平装本，都已注意到装帧设计的整体性，都认真考虑到了开本、护封、封面、环衬、扉页、版面、头花等项目的整体感，比较完善地达到了和谐统一的艺术效果。其中，曹辛之整体设计的《郭沫若全集》得到广泛好评。这本书从护封的富有动感的古纹样，不同书类的色调变化，到封面上作者那雄飞流动的草体签名的安排，书脊上凝重的魏碑字体书名，再到环衬的区别设计，以至扉页、像页、篇章页的设计，都一一作了

大方而绚丽、统一而有变化的艺术设计，这就使《郭沫若全集》的内容在体例结构、层次等方面体现出系统性和完整性，从书籍的外部形态到内部安排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由任意整体设计的《中国历代服饰》，其色彩与平面的构成，以及熟练地运用形式法则及设计层次，引人注目。

至于期刊，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大多数期刊社都由美术编辑负责全部设计工作，因而其整体设计问题，较早地得到不同程度的解决，至八十年代则有更多的创新与提高。一九九一年秋，全国举行了期刊整体设计和印刷质量评比，有《上海画报》等175种期刊获奖。

总之，七十年代末期以后，中国的书刊装帧艺术呈突飞猛进的形势，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在设计手法上更加丰富多彩，佳作如林。例如刘玉山设计的《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故宫博物院藏明清扇面书画集》、《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三书（均为人民美术版），连续获得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年莱比锡国际书展“世界最美图书”奖。张卫设计的中篇小说《诱惑》（湖南人民版），封面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帛作图案，扉页有戏曲脸谱，富有东方文化的气势和神韵，但观念与手法又很现代化，用色强烈、果断，构图是超现实的。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的夫人、作家包柏漪说，她第一次看到中国大陆的小说集出得这么漂亮。一些美国作家还说：这样的装帧设计在美国也算第一流的了。当代中国的书刊装帧艺术已经走向世界，进入世界装帧艺术中的高层次行列。

在八十年代的设计中，也出现某些商品化倾向，有对书刊的文化特点和气质注意不够的缺点，这在大部分

杂志和少数的图书封面上表现突出：美女占据了绝大部分封面。让艺术之神垂下她圣洁的头，去屈就庸俗之徒寻找感官刺激，这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装帧艺术家所不屑为的。这种倾向早已引起广大读者的不满，出版界和有关单位也正在认真纠正。

编务工作

编务工作实际上是编辑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随着编辑工作的过细分工而出现的。大、中型出版社通常都把编辑工作中的事务工作、辅助工作和编辑业务的管理工作从编辑部分离出来，称为编务工作（一些小型的出版社和编辑部内，编务工作仍由编辑分别担负）。编务工作既为编辑工作服务，有利于提高编辑工作的效率，又协助总编辑管理编辑业务，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诸如草拟编辑工作的规章制度，汇总编制选题、发稿计划，翻译选题查重，掌握各种出版物的生产进程，调节编辑部与出版部门等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处理读者来信来稿，组织本社出版物的宣传和评介，采集、管理信息资料，管理版权、稿费、书稿档案、文件和样书，以及对外合作出版中的有关事项等等，都属于编务工作的范围。大多数出版社都设置了承担编务工作的部门，有的称为编务室；有的叫做总编辑办公室（简称总编室），不过有些出版社的总编室除处理日常编务工作外，兼有参谋决策的职责。编务室（总编室）通常设有通联、宣传、资料、秘书、版权等科（组）和承担某些事务的专人。

由于编务工作的方面多、头绪繁，本章只能择要就